

创新集群的成长与演化

——第十二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论文集

梅丽霞 ©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71103202)

创新集群的成长与演化

——第十二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论文集

梅丽霞 ◎ 主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新集群的成长与演化：第十二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论文集 / 梅丽霞主编. —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11

ISBN 978-7-5100-8902-2

I. ①创… II. ①梅…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F1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3057 号

创新集群的成长与演化

——第十二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论文集

责任编辑 李汉保

封面设计 高 燕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 箱 sancangbook@163.com

印 刷 武汉三新大洋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4

字 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8902-2/F · 0163

定 价 119.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池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胡汉辉(东南大学教授、博导)

胡立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MBA 学院教授、博导)

金祥荣(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梁琦(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王珺(广东省社科院教授、博导)

王缉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导)

臧旭恒(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曾刚(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教授、博导)

关于产业结构之谜的思考

(代序)

王缉慈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优化结构中稳增长，在创新驱动中促转型。由此，以创新来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鼓励服务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工作摆在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诸如“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词组频繁地出现在政府文件和学者论著之中。不少省份提出了产业规划，对重大项目、示范园区建设等进行了部署。然而，何为优化？如何调整？学界纷争，至今未有明确的答案。

产业结构是何物？在中国至今仍是个谜。

轻重工业之谜

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策思维，生产资料生产是提高人民福利的前提，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就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并举。长此下来，造成了轻工产品的严重短缺，带来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契机，加之国际产业转移，以民营企业为主力的轻纺工业活力迸发出来。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简称WTO)之后，消费品制造业一度发展迅猛。

以劳动者利益、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轻工产品制造，使很多企业徘徊在利润边缘。装备制造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也逐渐暴露，于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开始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然而，过分投资于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又造成了产能过剩危机。由此，一些地方又要求产能过剩行业向消费品行业领域或服务业转型。

经济学家们曾就经济增长模式与重化工业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我国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不能不顾地方条件发展重化工业，轻视或排斥原有轻工业。因此既要通过创意、文化和高技术的渗透来提升传统轻工业的竞争力，又要发展节

能和环保的绿色重工业。一种以衡量、预防、限制、减少或纠正环境破坏、降低环境风险、生态建设等为使命的商品生产和咨询服务业——生态产业(又称环保产业)呼之欲出,并突显出环保技术开发应用和创新的重要性。

产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型之谜

产业结构高度化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会下降,由资本密集型替代,继而又让位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和知识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轻工业部门多为劳动密集,重工业部门多为资本密集,而生产者服务业多为知识和技术密集而又是高技术劳动密集的。

片面追求发展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而忽视本地基础雄厚的传统产业显然是愚蠢的做法。企业如果盲目地争相进入新兴产业,却处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则会有很大风险。如果不顾条件简单地只支持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而排斥鞋业、服装业、玩具业等本地优势产业,则会误导地方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迁与升级是演进的过程。要重视传统产业对地方的税收、就业、资本积累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支持企业通过产品创新、过程创新、营销创新、组织创新,提高传统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获利地位与能力。

传统产业中也需要高技术应用和创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例如时尚的服装和鞋类产品的设计样式、颜色、质料的选择都具有文化或知识特性,这些产业可以获得国际竞争力。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涨时,本地传统产业可以将低端环节转移出去而向制造高端产品升级、向设计和营销等服务环节升级。因此,问题不在于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所从事的产业,而在于企业所处的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也就是说,产业升级的分析单位需要从“产业”、“部门”转向“价值活动”或“价值链环节”。

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以及一、二、三产业比重之谜

很多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都是“调优一产、壮大二产、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而调整的成效通常用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变化来衡量,逐渐增加二产比重,实行工业强省(市、县)战略,进而加大三产比重。

按这种思路,轻视农业而转向制造业的倾向很难改变。中国仍有很大比例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高端蔬菜、花卉品种、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等高度依赖进口,农业尚未摆脱依靠土地而不是依靠先进技术和服务来推动发展的局面。殊不知,在丹麦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农业在经济中仍然重要,以生物技术引领的先进农业仍然盛行,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在我国,尽管制造业基础还不够强大,尚处于艰难发展之时,社会上对制造业的轻视却在加剧。很多企业刚刚获得一定的资本和知识积累,本该继续做强和做精产品,增

加其核心竞争力,却逃离制造业,转战房地产。一些企业上市后,面对所融到的大量资金,为了吸引眼球而寻求所谓“热点”,忙着圈地、做多角化经营,最后却削弱了主业的竞争力。一些企业缺乏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使区域制造业陷入低端锁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强调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把增加第三产业比重视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万能药”。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德等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竞争力。很多公司把生产线转移回本国,它们认为外包会降低公司对市场的敏感性,因为设计师、工程师、咨询专家、消费者远离制造端,公司无法快速反应客户的需求。

欧盟2013年产业结构报告指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联系正在日益增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服务业。强大的制造业有助于其他经济领域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制造业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增长会蔓延到服务业,这一点特别重要。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中,服务业份额越来越大是由于高收入群体对服务的需求弹性较大,随着收入的增长,中产阶级的最终需求往往转向服务业;相对来说,高技术制造业的生产率比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生产率较高,制造业价格相对下降,因此从就业来说,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移位很明显。

发达国家自1995年以来,制造业企业对中间业务的使用已横跨几乎所有行业。中高技术制造业不再被机器操作员及装配线工人所支配,而是越来越多地将服务作为其业务流程的一部分,更多地使用与服务相关的员工,更多地在使用服务中创新,以提高生产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流程的效率,从而提高生产率,进入潜在的新市场。制造业为服务业提供着“载体功能”。例如智能手机的销售需要使用软件应用等服务,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而设备制造商与软件服务供应商之间的互补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载体刺激着服务活动创新和质量的提升。

建设园区和新城之谜

科技园区和新城等在局部营造创新环境的关键,是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创新,并非房地产本身。当前,国内一些地方政府正试图布局新的园区,制定产业结构调整的路线图、调整标准以及时间表等等,把产业结构优化的希望寄托发展园区经济上。但有时适得其反。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增长方式的口号下,对GDP和权力的追逐使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人为地制造各类“项目”,忙着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并没有很好地关注企业的空间战略和实际空间行为。

当下各种名目的园区和新城建设方兴未艾,但地方决策者往往过分重视园区硬件建设,而不重视创新环境的营造;只引进国外该类产业的概念,而不重视我国某地区在这种产业活动中所处的价值环节。过多不切实际的产业地产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资源消耗,恰恰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大敌。

应该说,园区或新城建设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政策措施。例如丹麦为加速农业和食品业的创新,正在奥胡斯市(Aarhus)建设3万平米的农业食品园区(Agro Food Park)。这是地方政府与产业届合作行动的集群动议,使丹麦的农业科技研究所、知识中心和二十多个专业化公司等机构为农业和食品技术研发和应用密切合作,该项目将于2020年建成,将会使丹麦在肉、奶等农牧业和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加强大。

然而,投入巨资建设园区或新城本身是有风险的,要因地制宜地开展科学规划和合理建设。园区和新城是对企业的承诺,以促进经济发展和营造创新环境为初衷,要经过长期的耐心的努力,吸引足够的企业和机构,在合作机构的促进下,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中,产业融合,知识溢出,不断催生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形成充满创新氛围的和谐的产业社区。依靠外力的发展要逐渐与培育本地社区(如本地配套企业、相关生产者服务企业、知识密集型员工和一线劳动力等)的内生动力结合,否则难以持续。

企业规模之谜

企业的规模分布、大小企业比例与部门业绩和产业竞争力密切相关。一方面多区位的大企业快速成长,另一方面小微企业数量和贡献占比持续增加。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并充分重视中小微企业。例如,在欧盟2013年企业总数中,99%是中小企业,它们共提供约6500万个就业岗位,并有强劲的增长潜力,有大约200万个中小企业主要非资金密集型的服务业中新生。中国需要鼓励企业家精神,发展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创新集群,发挥中小企业的集体效率。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下,我国内需增长强劲,为中小企业创业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机不可失。

创新集群之谜

我国的产业集群同各类开发区一起制造并出口了大批量廉价的工业产品。然而,随着国际国内经济风云变幻,这支曾经代表着中国制造崛起的重要力量逐渐失去了其神秘感,不断显现出各类问题。在摆脱出口依赖、重整经济以及发展实业,增加就业机会的背景下,产业升级对于现阶段许多集群来说,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多年前,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权威学者H. Schmitz教授就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出“参与全球价值链,在地方集群中升级”的观点,这种观点也被写进2002—2003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年度报告。与此同时,研究发达国家创新集群的真谛,吸取其经验,受到中国相关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密切关注。

在走出经济低迷、摆脱出口依赖的过程中,知识型服务业是否能得到发展是集群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为此需要把创新的内在驱动力作为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问题来研究。多年来,发达国家对知识型服务业(KIBS)有大量研究和实践,但是我国还停留在“生产型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理念,对于“创新驱动”、“知识网络”等理解还差得很

远。在集群中的知识型服务业的“嵌入”是渐进的过程,而不是凭空打造的。要提升集群的竞争力,地方政府不能只是做一般性规划,或对中央政策的简单传达,而要下工夫弄明白企业对知识型服务业的真正需求是什么。

综上,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是其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果。各个部门的就业份额和附加值取决于生产率增长、需求结构和国际贸易等诸多因素。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推动着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不合理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对产业结构毫无认识却空喊产业结构优化,结果却可能使产业结构恶化。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中低端位置,均源于技术相对落后和创新生态系统不够良好。企业需要技术创新,还要踏踏实实从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的研制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做起。产学研需要互动合作,还要从改革科技评价体制做起。一句话,还是要回归以教育为本和技术立国这个根本问题上来。

丽霞嘱我为这本论文集写序,而此时我有他事在身,无暇提笔,遂将年中撰写的关于国内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文章整理出来,是为代序。

“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ICRD)系列学术会议由中国产业集群研究协调组主办。该会议从2002年肇始,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二届,先后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中山大学广东省发展研究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东华大学旭日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地理科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和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组织承办。中国产业集群研究协调组由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系列会议的组织者联合组成,研究者来自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种跨学科领域,在促进我国产业集群和区域发展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方面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2013年7月,第十二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会议落户于湖北武汉,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MBA学院联合主办,年会主题为“创新集群的成长与演化”。该会议紧密结合国情,深入解读了当前国际、国内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围绕着“转型情景下的中国产业研究”、“产业集群发展和政府角色转变”、“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产业集聚与环境治理”等当前发展中的重大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和充分争鸣,取得了积极而重要的研究进展,大会获得了圆满成功。

第十二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共征集论文百余篇,经专家评审和编委会筛选,共选取44篇,形成了本论文集,以飨读者。

(注:王缉慈(1946—),女,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地理联合会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指导委员。)

目 录

1	为何经济地理学不是演化科学? ——走向演化经济地理学	1
2	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水平和其物流能力关系研究	20
3	商业生态系统视角下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三聚”路径	39
4	产业集群的异地转移与本地升级	48
5	R & D、FDI 知识溢出及其区域创新效果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实证分析	57
6	后工业化家纺产业集群创新转型	70
7	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知识共享模式构建研究	79
8	我国创新集群发展探析	86
9	江苏省制造业转移趋势的综合测度研究	94
10	集群式升级:传统产业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无锡惠 山产业集群案例研究	106
11	集体学习、集群性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研究	120
12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的动态影响——对我国汽 车产业集群的实证	127
13	政府认知视角下的集群升级——以广东专业镇为例	144
14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宁夏清真食品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158
15	FDI 与产业集群的互动研究——以浙江制造业为例	168
16	环同济设计产业集群中的城市更新案例研究	184
17	动漫产业和玩具制造业的整合——以喜羊羊和奥飞动漫为例	193
18	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与创新集群的成长路径——以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为例	202
19	集群企业网络动态能力、刻意学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黑龙江六 大产业集群的实证	214
20	基于产业集聚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研究	227
21	武汉市高端装备制造业协同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	234
22	从流动集群到组织化运营——城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体系的转型	241

23	产业集群对区域发展影响研究——以浙江省纺织业产业集群为例	260
24	推拉理论视角下外来人力资本与产业集群的本土相融性研究——以浙商与江苏产业集群融合为例	271
25	产业园区模式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以大连生态科技创新城为例	282
26	区域内知识的三重结构——从企业创新行为、集群创新网络到区域创新体系	289
27	产业集群视角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298
28	基于熵指数、行业集中度和 HHI 指数高技术产业集聚度研究	306
29	我国纺织产业集聚的定量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16
30	产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研究	323
31	社会资本:一个基于多元视角的理论综述	339
32	制度、组织与知识研究:基于演化和空间	347
33	集群化协同技术创新多维复杂性特征研究	362
34	产业集群地方实践的困境与建议:一个政府的视角	371
35	从产业集群到区域创新系统: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的集群升级方向与路径	382
36	产业规划视角下的广州市人口变动研究	396
37	技术标准联盟的内涵和运作模式研究	413
38	产城融合视角下服务业与制造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研究——以盐城环保产业园为例	422
39	基于区域创新体系的高科技园区策划方法研究——以广州知识城为例	431
40	从地方化到去地方化: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空间格局变化	443
41	资源环境约束、认知行为偏差与产业集群发展困境——基于江苏特色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	461
42	论产业集群是否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	485
43	Market Centralization in Clusters' Development as Research Area In Ukraine	492
44	Mixed Duopoly with Foreign Firm and Subcontracting	504
	后记 成长在创新与创业的大时代	527

1

为何经济地理学不是演化科学？

——走向演化经济地理学

译者：包卿，江苏省江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原作者：Boschma and Frenken，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在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地理学领域中发挥重要影响的新古典、制度和演化方法的异同。通过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比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这三者之间方法的异同。当前显而易见的是创新性理论主要在新古典和演化理论之间（尤其在模型方面），以及在制度和演化理论之间的交叉方面（尤其在理解理论方面）。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演化经济地理学是一个不断呈现新鲜活力的经济地理学领域。尽管如此，目前演化经济地理学尚未能形成与其他理论方法相区别开来的独特理论方法。

关键词：演化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地理学

一、引言

自从经济学进入“地理转向”以来，“方法论之争”便在经济地理领域不断地发热（Martin, 1999）。从1980年代，经济地理便开始脱离传统经济分析，利用社会、文化和政治科学的洞察转向更加“跨学科”的一边。这种转向在经济地理学那里被归结为“文化转向”（Amin & Thrift, 2000; Barnes, 2001）或“制度转型”（Martin, 2000）。10年后，随着克鲁格曼（1991a）的一个开创性贡献，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已重返“经济地理学”（Fujita et al., 1999; Brakman et al., 2001; Fujita & Thisse, 2002; Puga, 2002）。当然这也遭到了经济地理学家们的顽固抵制。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正重新焕发了他们对“地理”的兴趣，而地理学家们却正远离经济学，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之间的争论鲜有结果，这种情形犹如“聋子之间的对话”（Martin, 2003）。

演化经济学可视为经济地理学的第三种方法，但迄今尚未受到真正关注。虽然，对

演化思考和演化概念的溢美之词不断增加(Storper, 1997; Cooke & Morgan, 1998; Martin, 1999; Sjöberg & Sjöholm, 2002; Cooke, 2002; Scott, 2004),然而经济地理学目前还是很少系统性地应用演化经济学(Rigby & Essletzbichler, 1997; Boschma & Lambooy, 1999; Essletzbichler & Rigby, 2005)。当然,在经济地理学界看来,演化经济学自身也尚未发展为内在一体的理论与实践。客观公正地说,演化经济学家们比经济地理学家们更积极地将演化经济学引入经济地理学论题(Arthur, 1987, 1990; Swann & Prevezer, 1996; Antonelli, 2000; Caniëls, 2000; Breschi & Lissoni, 2001, 2003; Bresnahan et al., 2001; Klepper, 2002a; McKelvey, 2004; Brenner, 2004; Werker & Athreye, 2004)。也许正是因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影响尚还微小,所以经济地理学家们或多或少地将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不加区别。

我们提出“经济地理学的演化方法”这一论题,相似情形,韦伯曾经在其开创性论文中指出“为何经济学不是演化科学?”。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提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要素。在描绘出这一新方法的主要轮廓之前,我们要指出,经济地理学界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是不能还原到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为此,我们首先将概括出经济地理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两大理论进展:一是1990年代左右的新经济地理;二是1980年代左右的文化或制度转向。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解释了这两股思潮之间为何存在较大冲突而不是相互交流借鉴。在第三部分,我们提出了三个议题,重现了经济地理学内部的分歧(经济学也如此)——讨论的假设、数学方法的使用,以及静态和动态的差别。在此框架下,我们探讨新古典、演化和制度方法的异同点。我们展现了演化方法的价值,并提出演化经济地理学实际是“新酒装新瓶”。为了展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新颖性,我们在第四和第五部分比较了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差异性。尽管这种比较尚未能够体现出系统性,但是显然是值得鼓励的,并且已经有很多成果。演化经济地理学方法是富有独特性的,这主要体现在它的核心假设、分析单元和解释风格方面。文章的最后部分,为了证实我们的论文观点,我们勾勒出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轮廓。

在介绍经济地理学的三种方法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讨论和比较每一种方法的具体细节(参见Nelson, 1995a; Hodgson, 1998; Marchionni, 2004)。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避”掉一些细微差别。我们主要参考了这三个理论的“教材文本”,这不是说“现代作品”都非常合适于这三个理论。相反,这提醒我们:程式化地区分这三种方法主要是为了使用方便,并最终有利于理论方法之间的融合。

二、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讨论

过去二十多年间,经济地理学被认为经历了很多的“动荡”(Martin & Sunley, 1996;

Amin & Thrift, 2000; Barnes, 2001; Meardon, 2001; Overman, 2004; Scott, 2004)。如果说经济地理学中新近有所“演化”，一般认为是由克鲁格曼等所开拓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应用。接下来，我们以“新经济地理学”来专指这一新进展。我们也会使用“新古典经济地理”，借以包含了克鲁格曼之前的区域科学和新近的新经济地理学进展，两者都是从新古典的“效用最大化”和“委托代理”假定出发，以“均衡分析”推导出模型，这些都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

克氏的新经济地理学方法可以看作是新古典经济学对“贸易、专业化和集聚”解释的新拓展，缓解了常用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设压力。这基本上是一种微观经济理论，它以“经济人的理性决策”解释了集聚的存在和持续。在假定企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以及企业层面的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克鲁格曼的理论贡献表明集聚可以发生——不必假定区域差异或外部经济。尤其在交通成本下降的背景下，集聚和扩散均衡点的达成取决于企业和劳工是在集群中更受益还是扩散到更多区域受益。这个平衡点的转换是在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针对消费者的生产多样性经济——一方面是集群，另一方面是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此外，克氏的核心模型具有多个方向的延伸性，包括其他因素如人口稠密与失业(Fujita et al., 1999; Brakman et al., 2001; Puga, 2002; 更全面的综述参看 Neary, 2001)。

在克鲁格曼和其他经济学家着手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的同时，经济地理学家们也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研究。提及这一点，我们通常会指出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这一变化。我们可以把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看作是制度主义成功发展的一脉，其在经济学领域却鲜有成效。即使这样，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对“制度经济地理方法”尚未有充分论述(Martin, 2000)。同样的事实是制度经济学尚未形成内在系统性(Hodgson, 1998)。两者都被认为是一种方法的集中，在个性化事例上分享了共同的概念和兴趣(Samuels, 1995)。对于绝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而言，方法论和理论的多元化并不能推论出其内在不一致性。相反，多元化是方法论的核心，并受到鼓励，这一点至少在接受制度经济地理作为跨学科和综合科学的学者那里得到认可和接受(Hodgson, 1988)。

在其最为严谨的形式中，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经济行为差异”的原因是“制度差异”(Hodgson, 1988, 1998; Whitley, 1992, 2003; Saxenian, 1994; Gertler, 1997)。“制度差异”表现于企业和地域间(前者以组织架构和商务文化为表现形式，后者表现为“法律框架、非正式制度、政策、价值观和标准”等)。以制度的视角对这些经济单元的比较分析能够解释不同经济绩效的成因，如利润、增长、收入的分配和矛盾。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仅仅是对制度主义方法的部分解释。研究者可以区分“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两种视角：前者认为主要是制度及社会阶层控制决定个体行为；后者认为是个体的理性行为塑造了制度(Granovetter, 1985)。如在经济学中，老制度主义经济学主要对应于“过度社会化”，而新制度经济学(Williamson, 1985)重在“低度社会化”(从这个方面而言，接

近于新古典经济学)。我们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主义方法倾向于“过度社会化”,因为很多的经济地理研究主要侧重于制度,而不是个体行为(Gertler, 1997)。

一直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和制度经济地理学各自保持了独立发展,也展开了一些讨论(e.g., Amin & Thrift, 2000; Martin & Sunley, 2001)。我们赞同马丁(2003)观点:富有成果的思想交流还是鲜有发生。相反的观点认为,讨论已经很激烈,但没有进展而已。毫无疑问,两股思潮的基本方法存在较大差异。我们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至少反映了两大不可调和性。

首先,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空间”这一概念。制度经济地理学者拒绝使用模型和计量经济学规范进行演绎推理。相反,他们使用一种归纳的方法,通常是案例研究方法,突出“现实空间”的地方独特性。制度分析的一大目标是理解“现实空间”的“地方独特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这也是导致不同空间尺度下“地方特色制度”的原因。因此,任何一种制度分析方法在不同地方的展开是不同的,如在对起点的分析和“地方特色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方面。相反,新经济地理学在假定“效用最大化”和“委托代理”的前提下,使用模型进行演绎分析,利用“均衡分析”进行理论推定和预测。新经济地理学不认同甚至拒绝那种突出地方特色的案例研究(e.g., Overman, 2004)。新经济地理学忽略区域差异的存在,但事实上在“要素价格”或者“制度建制”上是存在差异的。再者,这些模型的建立起始于对“原子空间”的假定,目的是解释集聚如何发生的。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展现“不均衡的空间模式”是如何在起初“均质世界”中产生的,因此,他们从不同的“地方特殊性”和不同尺度的“空间集聚”中进行抽象概括。

第二,这两种方法在解释经济现象时存在“行为假定”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的目标是从个体经济行为“效用最大化”中解释经济活动中的地理模型。制度经济地理学者则是假定:经济行为并非如“效用最大化”所言那样准确精致,而在“行为规范”框架下能够更好地理解。个体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身在其中”的制度进行行为决策。“制度”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实践中,这就要求区位(“真实空间”)和分析单元相联系。通过这样做,制度经济地理学分析了“制度的特殊性”影响了经济行为和由此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反,制度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或者仅仅是一种模糊和不言而喻的感觉(例如模型中特定相关参数)(Olsen, 2002)。地方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在分析模型中被遗漏了,因为这在经济分析中认为是不必要的,是认为应该留给社会学家们干的事情,克鲁格曼就是如此处置的(Martin, 1999, p. 75)。

我们认为“演化经济地理学”不同于新古典和制度主义,应该被纳入为经济地理学的第三种研究方法。它在经济地理学背景下使用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方法论,为主要经济现象提供了另外一套解释架构,包括集聚和区域增长差异。它的起点是解开“组织”的黑箱,且视“组织间的竞争”是立足于“与时演进积累”的“惯例”基础上的(Nelson &

Winter, 1982; Maskell, 2001)。“组织演化模型”的建立是在两大概念基础之上——“有限理性”和“惯例行为”,而不是“效用最大化”(Simon, 1955a)。“惯例”可以理解为“组织技能”,但不能简单认为是“个体技能”的总和(Nelson & Winter, 1982)。在企业层面,“惯例”是显现的,这是因为在企业中的员工因为技能特长不同而有劳动岗位分工差异。对应于个体技能的“组织惯例”是由大量实践知识(干中学)和那些难于编码的“隐含知识”构成的。这就使得企业之间很难模仿(Teece et al., 1997)。因此,组织的多样性在于他们“惯例”的多样性,并持续作用。因此,组织的模型化不再依赖于委托代理假设。正是这种多样性在经济发展处于可以变更和超越平衡的过程中丰富了选择(Hodgson, 1999)。而且,组织在建立“惯例”基础上的竞争的同时,特别强调对于熊彼特式的创新驱动所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技能,由此形成“新惯例”,而这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认定的生产成本。

总的来说,演化经济学揭示了“惯例”的分布——搜索和选择的结果(Alchian, 1950)。首先,企业在试错过程中总结失败教训,当“惯例”不能良好运作时,失败会引致更为活跃的对“惯例”的搜索(Nelson & Winter, 1982),如通过投资研发。演化经济学喻示绝大多数企业是在过去基础上不断增加创新和开拓知识的。经验研究表明创新提高了企业生命周期(Cefis & Marsili, 2006),但组织转变是趋于降低企业生存概率的(Anderson & Tushman, 1990; Carroll & Hannan, 2000)。组织在带着竞争的危险“拷贝”和“模仿”其他企业时,也通过网络来学习(Cowan & Jonard, 2003),尽管模仿往往是失败的——因为“惯例”中的隐含知识是难于拷贝的(Teece et al., 1997)。其次,“知识情报”是作为一个整体在产业层面存在的,正如生物界的种群(Nelson & Winter, 1982)。只要企业展现了“惯例化”行为,市场竞争就如一个选择装置,它保留和放大精明合适的“惯例”,消除愚笨不合适的“惯例”。尤其,利润差异导致不同的成长率这使得更合适的“惯例”在产业内具有优势。这种选择逻辑是与企业成长实践中自动纠错机制相一致的,这意味着一些企业能够持久成长(Bottazzi et al., 2002; Cefis & Orsenigo, 2001; Cefis, 2003; Garnsey et al., 2006)。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目标是理解随着时间变化“惯例”的空间分布。它尤其着力于分析空间中创新和新“惯例”的扩散,以及通过什么机制使得更合适的“惯例”扩散开来。遵循这种逻辑,空间集聚的出现既不是新古典理论所言的区位理性决策的结果,也不是制度理论所言的建立特定地方制度的结果,而是要以嵌入在组织“惯例”中的知识历史性地空间中成长集聚来分析。沿着这个视角,就有几个演化机制使得企业空间集聚。

集聚可能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偶然事件被企业层面的正反馈所放大(Arthur, 1990)。因为通过学习,成功引致更多的成功,一些企业将成为幸运者并成长为产业领航者,而另一些企业是不幸的并最终消失。成功企业产生更多的、更成功的溢出效应,这些几乎都保留在区域内部。由此产生的产业和空间动态牵涉到企业和区域

关系的路径依赖,一旦一种空间模式被历史性地“设定”,就会很大程度上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聚集经济,演化过程也可导致空间集中(Klepper, 2002b)。空间集聚也可能是区域层面的报酬递增。知识不仅根植于企业的组织“惯例”中,而且也可能从一个企业传播到另一个企业。正如默知识难于通过全球市场的联系而得以交换,知识溢出更多地是在地理临近的空间中发生(Jaffe et al., 1993; Breschi & Lissoni, 2003; Verspagen & Schoenmakers, 2004)。集聚经济既是一种激励机制,又是一种选择机制,它解释了经济活动为何驱使企业从其他区域集中到一些领先区域(Malmberg & Maskell, 2002; Boschma, 2004)。

接下来,我们讨论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新古典和制度方法的联系,它认同新古典的“规范建模”方法,而在行为基础上它认同制度方法(如有限理性)。考虑到这些相似性,我们可以预期沿着演化、新古典和制度方法之间的交集在经济地理领域进行丰富的思想交流。我们因此将具体讨论演化和新古典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交集(第四部分)和演化和制度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交集(第五部分),与这些安排相呼应,在第三部分,我们简要地描述了经济地理学的三个主题,这样有利于深入讨论过程中对这三种方法的交集性质有深入的理解。

三、经济地理学的三个主题

自从我们从演化经济地理学那里获得一种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地理学的方法之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清晰表达出这三者在方法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尽管任何试图从学科视野来刻画和描述其主要特征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但我们感到这将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将一个新方法和既有方法区别开来,以及表示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在思想方面更加亲近的关联。我们将通过以下三个主题加以介绍、展开。对此,我们以图1的三角形加以图形化描述。每个主题由三个方法中的两个组成并与第三种方法加以区别比较。这三个主题再次一起在经济史和经济地理学史中被展示出来。

第一个方面主要讨论规范建模的有效性,这部分主要讲述演化和新古典学者的主张,以及比较他们与制度学者的区别。前已述及,绝大多数制度主义学者拒绝规范建模,因为“它”不能把握住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Martin, 2000)。根据制度主义学者的意见,“规范建模”就如一个规则,这个规则采取了反现实的立场,因为它排斥了“地点的特殊性”因素(如文化和制度),这些是难以放入“希腊经济学”里的,但却在解释区域差异时发挥了重要作用(Gertler, 1997)。相反,新古典和演化论学者以不同的途径采用“规范建模”作为理论化的工具。

第二个方面集中在理论假设的争论。演化和制度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个人效用